

1415
Z58

语言得体艺术

郑荣馨 著

书海出版社

策划责编:王晓珑

助理责编:王兴军

复 审:郝建军

终 审:张安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得体艺术 / 郑荣馨著. —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1.9 (2002.4重印)

ISBN 7-80550-352-4

I.语... II.郑... III.修辞学—研究 IV.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552 号

语言得体艺术

郑荣馨 著

*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印刷协会实验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5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1-5500册

*

ISBN 7-80550-352-4

G·343 定价:16.00 元

序

荣馨先生前一些时候来信请我为他的新书《语言得体艺术》作序,我欣然答应。

爽快地答应作序的原因是:第一,老朋友了,我也曾为他的第一本书写过序言;第二,他作为一个中师教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三本书,同时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真了不起——记得80年代我为老同学朱永赓的专著《叶圣陶语言修改艺术》写序言时说:一个中学教师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竟然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我真是佩服极了,这使我们这些身在高等学校的人有些儿惭愧;第三,对于得体问题,我一向很有兴趣,把得体性原则当作修辞学的最高的、惟一的原则,又是我在《修辞学通论》中正式提出来的,现在荣馨写出了专著,当然是很高兴的了。

二

对得体问题,我的确是考虑得很久了。

在我写作《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时候,才终于下了决心,专门写了一章来谈论得体性原则,我把它当做是唯一的、最高的原则,当做我的修辞学体系中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同“语言环境”、“同义手段”并列构成相互联系着的概念系列。

如果说修辞活动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张志公先生的《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一文已经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我的《有物、真实、切题、适量》同时选入了这一册课本——那么同义手段是被选择的对象,语言环境是选择活动的参考框架,而得体性原则是选择的指导方针。三者是相互联系着的,相互依赖的:没有同义,选择什么?没有语言环境,根本就不需要选择!没有原则,就无从进行选择!所以在我看来,所谓修辞活动其实就是在得体性原则的指导下,把语言环境作为一个参考框架,对同义手段所进行的一种选择活动。

这得体性原则的提出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的确是出乎意料的。其中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甚至有些是比我还积极的,迅速地进行探索。老朋友李名方先生编辑出版了《得体修辞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还写了一组论文,还考虑组织力量编写一本《得体修辞学》。当然也有很不理解的,老朋友李晋荃教授就曾当面提出:得体怎么能一下子成了最高的、惟一的修辞原则呢?我的回答是,我说的得体是一个专门术语,不再是“委婉得体”中的那个“得体”了。也有人说我主张得体性原则是法国大小说家福楼拜的“惟一”说的翻版。我说:不对,得体并不是只有一个、惟一的一个,其实许多种说法都是得体的,在众多的得体的说法中,只有相对来说比较得体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一个是惟一的最高级得不能再得体的说法的。

在得体性原则的众多的影响者中间,我个人的感觉是:郑荣馨先生的理解是比较接近我的想法的,而且也是继续探索最积极的一个。他陆续发表了好些关于得体性原则的文章,也曾多次同我讨论,每次他提出了新看法,我都表示支持,鼓励他去进一步探索,希望他能写出一部得体性原则的专著来。

据我所知,想在得体性原则方面下一番工夫,想写作得体修辞学的人还不少,有些也多次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只有郑荣馨,正

是郑荣馨先生在这短的时间里，拿出了一部关于得体性原则的专著来。

我是很希望有一部得体修辞学专著的，我也相信以得体性原则写出来的专著一定是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但是我没有做这一工作，现在郑荣馨先生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是非常高兴的。

这部《语言得体艺术》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得体修辞学著作，也许还是世界修辞学史上的第一部得体修辞学著作呢！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三

这部《语言得体艺术》是成功的，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全书共八章，前六章建立理论系统，除去第一章的“概论”，第二章是理论的探索，带有论辩性质——我不说是论战，有针对性，有较浓的理论色彩，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论述得体的“四性”：层次性、文化性、主体性和辩证性。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它的学术价值之所在，或者往高处说是作者的一个功劳——甚至是贡献（现在广告式评论太多，“贡献”一词早已经贬值了）。最后两章是具体运用，一章是“教学语言的得体性”，另一章是“语言得体性例析”。这样的结构，是理论探索 and 实际运用相结合，是雅俗共赏，自有它的好处。我深知作者如此处理是有他的用心和苦衷的。作者是教师，对教学语言是熟悉的，从出版来说，教学语言得体性问题是社会需要的。加上“例析”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读者。不过在我看来，本书篇幅已经不能算小，如果舍弃最后两章，保持理论探索的特色，以建立一个新体系为目标，也许更好，而索性以最后两章为基础发挥、发展出去，再写一本通俗易懂的、直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书，也许会取得更大成功的吧。

四

得体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老话题,但是作为修辞学的惟一的、最高原则的得体原则则是一个新课题。这里有许多问题是很值得进一步深入地探索讨论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例如,得体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表达者说了算,亦或是接受者说了算,亦或是第三者说了算?这三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时候。

得体往往被解释为适应语言环境,这似乎消极了一点。我以为:第一,作为主体的表达者不但能够选择语言环境,还能够改变和创造语言环境;第二,现在似乎夸大了语言环境,一是否定语言本身有美丑好坏;二是把话语的好坏全部归结为同语言环境的相协调。完全适应语言环境并不全是好的,同语言环境相矛盾相冲突,也并不都是要否定的。过分强调服从语言环境就可能为庸人提供借口,就可能制造庸人。有时就是要同语言环境对着干,正是人格高尚的体现。

其实得体和不得体也是相对的,甚至是相互转化的。也有不得体的得体呢。禅宗大师的表面上的不得体中自有他的深层的得体性,否则人家问的是佛祖东来,你打他一个巴掌,这算什么呀?!对方怎么会因此而得道呢?

我曾对学生说过:人人以为复杂得不得了的东西,其实可能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而人人以为是极其简单的东西,却往往是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复杂的东西中找到最简单的模式,在最简单的东西中发现其丰富的内涵;不可以认为简单的东西就永远是简单的,复杂的东西就永远是复杂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在修辞原则问题上,在得体性原则问题上,也正是如此。所以在为郑荣馨的新著作序表示祝贺的同时,我

也表示:我很乐意同各位朋友一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有学术价值,有社会效益,而且很有趣味。

五

郑荣馨先生是江苏修辞学会的骨干力量,常务理事。江苏修辞学会正是因为有李晋荃、徐炳昌、朱永熾、李名方、林兴仁、季士昌、陈炯、陆庆和、沈孟纓、张炎荪、郑荣馨、钱原生、孙汝建、史灿方、庄关通、裴文、程培元、莫彭龄、曹玮、凌德祥、于广元、杨芳、曹德和、陈新、钟敏、钟玖英、魏南江、黄晖、江南等一批骨干力量才兴旺发达的。

荣馨的《语言得体艺术》的出版也是江苏修辞学会的一件喜事。江苏修辞学会将把得体性原则的探索当作一个经常性的课题。

相信荣馨和江苏修辞学会的其他同志在得体性原则问题方面,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王希杰

2001年4月26日于南京北阴阳营

前 言

语言的得体性是修辞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近些年来受到了修辞学界的高度关注。

任何修辞现象,几乎都可以,也有必要联系语言得体性来讨论、研究。以往的众多修辞学论著,不管是否明确使用语言得体性的概念,但就其具体的论述来看,常常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涉及到语言的得体性问题,只是明确的程度、概念的内涵、地位的轻重等方面有所差异罢了。

王希杰先生在1996年出版的《修辞学通论》一书中,将语言得体性论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得体性是修辞学中最重要概念,认为抓住了得体性原则也就抓住了修辞学的要领。这一崭新观点是对既存修辞学理论体系构建指导思想的富有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和超越,按照语言得体性最高原则的指导思想,完全可以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促使人们从新的思路、新的视角考察、研究、描述修辞矛盾的运动。以此为发端,修辞学界掀起了一股研讨语言得体性的热潮。

笔者赞同、支持王希杰先生提出的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最高原则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深深感受到这一课题的庞大、复杂、深奥。最高原则的提出振聋发聩,尚需牢固确立,赢得广泛认同;对语言得体性的诸多重大问题需要从宏观高度作深入的立体式探讨。在本书中,笔者就语言得体性概念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

不同指导思想构建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比较中展开论述了语言得体性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又分别从语言得体的层次性、文化性、主体性、辩证性等方面剖析、论述有关的重要问题，力求科学描述较深层次的规律特点。

语言得体性是实用修辞的生命线，对人们的语言交际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理论的规律植根于语言的实践。本书的写作，又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观点从材料中来，多举语言交际活动中的新鲜实例。鉴于教学语言在语言交际中的特殊地位，书稿专列一章，对教学语言的得体性作了具体详细论述。另外，因语言得体性关涉到语言交际的各个领域，为兼顾一般读者的需要，增强书稿的实用性、可读性，又专设了不同领域语言得体性例析一章，目的在于希望对人们的语言交际有所帮助，满足人们鉴赏的需求。

作 者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一	奇妙多彩的得体现象.....	(1)
二	语言得体的概念认识.....	(9)
三	研究语言得体的意义	(14)
第二章	修辞学的最高原则	(20)
一	语言得体性在修辞学中的地位	(20)
二	“最高原则”与“修辞手段”论	(26)
三	“最高原则”与“题旨情境”论	(37)
四	“最高原则”与“审美价值”论	(46)
五	“最高原则”与语言表达效果	(55)
第三章	语言得体的层次性	(63)
一	得体层次性概述	(63)
二	日常交际语言层次	(67)
三	社会交际语言层次	(74)
四	艺术交际语言层次	(81)
第四章	语言得体的文化性	(90)
一	得体文化性概述	(90)
二	符合文化背景的主调	(99)

三	适应民俗事象的特征	(112)
四	遵循审美观念的传统	(125)
第五章	语言得体的主体性	(149)
一	得体主体性概述	(149)
二	适应交际者的角色	(163)
三	适应交际者的个性	(178)
四	适应交际者的修养	(191)
第六章	语言得体的辩证性	(202)
一	语言得体地位的相对性	(202)
二	语言得体形式的多样性	(217)
三	语言得体因素的关联性	(227)
第七章	教学语言的得体性	(238)
一	教学语言得体性的特殊要求	(238)
二	教学语言得体性的形式特征	(249)
三	教学语言调控得体性的艺术	(260)
第八章	语言得体性例析	(275)
一	说明	(275)
二	公关语言得体性例析	(277)
三	演讲语言得体性例析	(288)
四	文学语言得体性例析	(299)
五	广告语言得体性例析	(310)
六	生活语言得体性例析	(324)
后 记		(337)

第一章 概 论

一 奇妙多彩的得体现象

语言表达的得体现象异常奇妙多彩、错综复杂，其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魅力和奥秘，值得我们去深入品味、探索和研究。

1960年，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周恩来总理审查出国节目时，对《霸王别姬》一剧和项羽其人说过精辟的评语。全剧开始时，刘邦发兵攻打项羽，接下来项羽金殿议事，群臣根据不利形势纷纷谏阻出兵，项羽不听劝阻，决意出战，宣布“退班！”戏演到这里，总理讲：“一言堂！”项羽回到后宫，虞姬继续规劝，千万不可发兵，以防误中刘邦奸计。项羽不容分说：“孤意已决，明日发兵！”总理讲：“一家之长。”当项羽孤军深入刘邦设好的埋伏圈时，总理说：“一意孤行。”项羽终于被困垓下，总理讲：“一筹莫展。”当虞姬备酒安慰项羽时，项羽心情沮丧，摔杯愤起吟唱“力拔山兮”，总理说：“一曲挽歌。”四面楚歌，汉兵将至，虞姬拔剑自刎，全剧终，总理讲：“一败涂地。”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戏，总理只用了23个字就把项羽失败的全过程高度概括了，言简意赅，且都是“一”字当头，殊为得体。

曾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陈健，素以睿智和幽默著称，有过不少精彩的答记者问。1994年9月29日下午，陈健主持记者招

待会。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问道：“请教发言人，邓小平先生会不会出席‘十一’国庆？”陈健答：“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境外媒体那些说法是捏造的。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出席‘十一’国庆，以及参加哪些国庆活动——我跟你们一样，会在10月1日的报上看到。”众皆大笑。1995年8月22日是邓小平91岁华诞，适逢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德国记者问：“今天是邓小平先生91岁的诞辰，我想问一下关于他的健康的说法是不是还是那样没有变化？”问得实在有点刁。他不问身体健康与否而问身体有无变化。万物皆处在变化之中，自然不能答没有变化，但假若说有变化，变好还是变坏？“变化当然是有的啦！”陈健拖长了声音，西方记者都竖起了耳朵，定神谛听。“他又年长了一岁！”原来如此！记者忍俊不禁笑了。“当然，他的身体状况是好的。”陈健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常态。上述两例，或出于保密，或出于避免误入记者的“圈套”，陈健回避了正面直接回答，却又说得入情入理，无懈可击，十分巧妙得体。

邓友梅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5期上讲述了在一次随外事委员会到一个地方视察时发生的事情。那地方因在乡镇企业中搞合资企业取得成功被当做先进典型，听惯了表扬歌颂。主持人要求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老政协委员发言：“请您谈点意见，不要客气。”那位委员就是与白求恩有相似品格和经历，取得了中国国籍的医生傅莱。他说道：“我是来工作的，不是作客的，客气什么？我不想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持人忙请他放开说。傅莱就说：“我先问一句，门口那辆奔驰车是谁的？”场上静了有一分钟，才有人说是某厂中方经理的。傅莱劈头盖脸又问一句：“你知道在外国是什么人坐那种车吗？”对方没有应答。他紧接着说：“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也是大资本家、大财东坐的，老百姓工薪层坐不起。你就坐上这个了？可你们那个企业劳动保护是个什

么样子？一间厂房挤了这么多工人，通道那么小，着了火怎么办？……”那厂长解释说这方面曾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傅说道：“我看事实。”说着他又往窗外一指：“那个皮靴厂是谁批准建的？外国人把又臭又脏的动物毛皮运到我们这里，洗清刮净之后再运走。所有的脏东西都留在我们这里了！他们外国怕污染，我们不怕污染吗？他们国家不许干的行当就弄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一番话说完，全场寂静无声，人们好像惊呆了。过了几分钟，轰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傅莱的一席话，不排除有不全面、可商榷的部分，但一腔爱国之心、负责之义令在座者尊敬、感动和赞同，主流是很得体的。

陈景润说过：成功与天才成正比；但与努力的平方成正比。有一个青年人，请爱因斯坦说出成功的秘诀。他写出了一个公式： $A = X + Y + Z$ ，并解释道：“A代表成功，X代表劳动，Y代表适当的工作方法。”青年人以为最大的秘诀在最后一项，就迫不及待地问：“那么，Z代表什么呢？”不料他回答道：“Z代表的是少说废话！”爱迪生曾说：“我平生的一切发现都是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其中天才和灵敏只不过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都是艰苦的工作。”三位著名的科学家，谈的都是取得成功的经验，同样是用数学比喻，但角度有异，表述有别，得体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色泽。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之后，打算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但又觉得这个名称不十分贴切。于是毛泽东决定广泛征求大家意见，把这个名称起好。消息传出，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来见。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慎重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周恩来解释道：“我们初步考虑叫‘支援军’，去支援

朝鲜人民么。”黄炎培听后摇摇头，说：“这么叫能说是师出有名吗？我觉得还需要斟酌。”“怎么师出无名呢？”周恩来问。黄炎培回答道：“‘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可这是谁派出去的？是国家吗？那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了，连连说道：“噢，有道理，讲得好！讲得好！”便将“支援”划去，改写成“志愿”两字，并解释道：“我们也不用跟美国宣战，也不是国与国宣战，这是人民志愿的事，是民间的事。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不是国与国的对立。”周恩来也高兴地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的志愿兵！”黄炎培扬声笑道：“这样师出有名，战无不胜！”一个名称，一词之改，得体不得体立见分晓，关涉到师出有名无名的问题，也关涉到国际关系的大局问题。由此也可悟到真正做到语言得体并非易事。

1998年12月18日《青年参考》上刊载了一位美国外教在中国医学院作演讲的稿子。讲的是一个故事：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一边沿着海边走着，一边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近在咫尺。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被干死的。

男人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他们扔回大海。终于，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小鱼

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今天，你们在这里开始大学生活。你们每一个人，都将在这里学会如何去拯救生命。虽然你们救不了全世界，救不了全中国的人，甚至救不了一个省一个市的人，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救一些，你们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因为你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从此有所不同——你们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你们能够并且一定会做得到的。

在这里，我希望你们勤奋，努力地学习，永远不要放弃！记住：“这条小鱼在乎！这条小鱼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这篇演讲稿生动、形象地劝戒人们努力、勤奋学习，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薄而轻易放弃，不但适合医学院的学生，而且对其他大学生，社会上的各种人均有启迪意义，发人深思。可不知何故，讲稿事先让校方过目时，一位领导不喜欢，让这位教师重写，而教师则坚持用此稿。看来，同一语言表达，得体与否各人标准有所不同，不过，客观的公认的标准是存在的，不以某些个别人的意志而转变。

1998年9月15日，整夜未眠的数十万九江市民，天没亮就倾城出动，等在街头，挥泪告别和他们生死与共，与洪魔搏斗了长达50多天的子弟兵。人群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中举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大字：“长大我要去当兵。”他叫赵框喜，是子弟兵们8月5日深夜在江新州决堤时救出的那群孩子中的一个，九江师专的一群女学生举起她们的标语：“兵哥哥，真的舍不得您走！”站在一旁与士兵们道别的董万瑞中将哽咽道：“我为有如此受人民爱戴的士兵感到骄傲。”泪水从将军的脸上流下。上面所引话语可谓言出其衷，感人肺腑。语言朴实无华，却

高度得体，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当年，著名维新革命家、大学者梁启超重病在身，始而延请西医诊治，效果甚微。其弟子谢国桢将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给他诊治。服药之后，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出现反复，主要原因是梁启超没有停止读书活动。萧龙友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当谢国桢将其意转告梁时，梁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声叹气，深感无可奈何。时过不久，梁启超病逝。几十年之后的1982年，谢国桢因胆结石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他反复发高烧，大小便不能自理，然而只要病情稍微稳定，他便在病房内读书工作起来。有一天，萧龙友的儿子萧璋教授前来探望，劝其在治病期间不要读书治学。谢国桢默然片刻，即正色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先生这句名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师徒俩都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不遵从医学的规律，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短短的话语中勃发满腔的战士的豪情，已非一般的得体能衡量之，令人赞叹不已。

一位女士与同伴坐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点上了一支烟。女士对同伴说：“你抽烟吗？”同伴说：“不抽。”女士说：“我也不抽。”然后是寂静。等了会，女士对司机说：“师傅，我本想委婉地提醒你一下，没想到你不觉察。那我就明说了，请你把烟熄了。”司机说：“我起得早，困。抽一支，提提神。我这车，不禁烟，没贴禁烟标志。”女士说：“这跟禁烟标志无关，而是你抽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司机说：“新鲜。抽烟这事，连老婆都管不着我，干吗要得到你们的允许？”女士说：“我们出了